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为权利祈祷

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加] 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为权利祈祷

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加] 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孙竞昊 校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加]卜正明著,张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4950-6

I. 为... II. 卜... III. 佛教-慈善事业-研究-中国-明

代 IV. B949.2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780 号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by Timothy Broo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3.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226

书 名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著 者 [加]卜正明

译 者 张 华

责任编辑 府建明 戴宁宁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3 插页 4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950-6

定 价 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译者的话

本书被纳入凤凰文库再版，这是翻译者的荣幸，更是原作者的光荣。与其说这体现了本书原著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社会影响正在升温并逐渐得到认可，毋宁说它给译者再次阅读和反思本书及检讨译事得失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和卜正民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两个人的心灵碰撞交流和共鸣的故事是在北大燕园那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求知创新的热情高涨和满怀理想抱负的特定环境中发生的。当时我一边做着以中国佛教复兴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一边广泛涉猎和吸收外国知识学术前沿的成果。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英文藏书中，我一次偶然发现了Timothy Brook所著的*Praying For Power*，立刻被它的主题深深地吸引了。通读全书后，它的主题内容和研究路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它对问题的精辟分析和深刻见解以及行文独特风格，令我不禁心折。于是我产生了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与国内读者分享的冲动，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相信它会启发并促动国内学界研究中国佛教

史学方法的革新,更主要的是它可以填补我们对唐以后佛教研究不足的空白,尤其是加深我们佛教在中国社会中运作的概念,对佛教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佛教与经济、政治、文化诸关系有一个贯通的理解。当我把上述想法和盘托出告诉刘东教授时,他给了我充满希望的鼓励。后来他从海外的朋友中了解到,Timothy Brook 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卜正民。

然而,卜正民究竟是何方人氏,目前多大年龄,现在生活在何处,这于我至今还是个谜,当然也是我不得不向读者致歉的地方。在翻译过程中,虽然我与卜正民鸿雁往来不绝,但从来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从北大毕业后我回了南方,因为工作任务重,事情比较多,一度与卜正民失去联系,直到本书 2004 年要出版时我请他写中文版序言。从中文版序言中,我对他的家庭背景和学术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出身于一个新教家庭,耳濡目染基督教的文化熏陶,却对包括中国佛教在内的亚洲历史文化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兴趣。以前我只知道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边留学研究边调查考察,现在我获知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就来到了中国内地留学,并且是在当时国内学者对宗教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样一个年代来到北京大学研究宗教,这让我既感到亲切又增加了些许钦佩。

据我掌握的材料看,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他开始接触中国佛教起,到 1993 年本书英文版问世,花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20 年的学养积累和殚精竭虑凝结成了本书原著的厚重。在这 20 年中,也许从他确定以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为研究主题并以之为他毕生的志业后,他的足迹踏遍了亚洲一些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他无数次地来往穿梭于太平洋的此岸与彼岸。看得出来,他接受过西方一流的正规学术训练,在中文版序言中,他自称把本书题献给三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恩师,其中韦尔慈(Holmes Welch)和傅乐施(Joseph Fletcher)两位出现在

本书的扉页上,我想还有一位应该就是指导他博士论文写作的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了。他们都鼎鼎大名,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韦尔慈,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资深教授,他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宗教研究专家,尤为专精于中国近现代佛教之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1968年和1972年陆续推出了韦尔慈研究中国佛教的系列著作《中国佛教的实践》、《中国佛教的复兴》及《毛泽东时代的佛教》,这三部书堪称为西方最负盛名的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三部曲”。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深情回忆当年求学哈佛时,韦尔慈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和灵感源泉”;在英文版序言中则认为本书是“受他的工作和人格典范的鼓舞所产生的成果”。

二

卜正民延续了韦尔慈研究中国佛教复兴的学脉而把复兴的历史视角从中国近代佛教拓展到了晚明佛教,确定晚明时代的佛教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为本书研究主题。这使他既没有重复韦尔慈,又与其他以著名佛教人物为中心单纯研究晚明佛教复兴的著作不同,他研究了一个比士绅出身的佛教人物更大的士绅社会集团与佛教之间互动及相生相长的关系,因而其研究的广阔性和复杂性非前者可比。更为独特的是,卜正民选择寺院的捐赠为研究切入点,精辟分析晚明士绅捐助寺院的机制和动机,揭示社会向宗教捐赠的普遍模式和捐助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从而使我们对近世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奥秘几乎能洞察入微。显而易见,他的研究结论放在今天仍有充分的说服力。

在西方和日本学界,佛教的社会研究和士绅社会研究都有各自的渊源和学术传统,但从来没有人像卜正民这样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晚明佛教的复兴及士绅社会的形成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

细致的社会学说明。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说明中国佛教的社会史没有像它作为宗教史那样引起20世纪中国学者的很大兴趣,其与西方和日本学术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导源于中国和西方现代性经验的不同。进一步说,西方研究中国宗教的兴趣和成果出现在后期殖民主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植根于亚洲和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西方并不真正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感到兴趣,它更感兴趣的是这种复兴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所以西方学者相对比中国学者更关注佛教的社会研究。而中国学者由于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刺激,他们在寻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也更重视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和优良传统并孜孜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的宏大叙事里自然也包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佛教的复兴,这也许是20世纪中国佛教学者致力于理清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在近二十年,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宗教复兴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中国学者才越来越关注佛教的社会研究。

到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反省和转变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传教路线和策略,他们渐渐地把中国宗教研究从过去传教士研究中国宗教的范式分离出来。到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崛起,这种趋势造成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更大的转移,这就是从东方主义话语转变到“以中国为中心”。西方汉学研究重心的转变在中国士绅社会研究中也得到明显体现。卜正民指出,中国士绅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1975年前士绅研究的关切点是挖掘中国社会中阻碍现代化革新的保守主义痼疾,考察中国社会的内在动力,以解释中国为何不能有效回应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尽管这种解释仍然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性范

式——按照现代性范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积极地回应西方的挑战，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从外界的入侵干涉，而是因为僵化的本土社会结构阻碍了现代西方制度的引进——但它为士绅研究从本质主义的定义转向历史的具体分析准备了基础。卜正民正是这样从历史主义的基点出发来研究晚明佛教与士绅社会的关联，他认为晚明佛教的复兴是因士绅之支持而形成的产物，但佛教复兴不是仅仅反映了晚明士绅的发展而本身就是晚明士绅发展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在地方境域中回应具体历史情境，以其文化的和经济的优势来追求自治权力的一种建构。士绅选择捐助佛教寺院这个恰当不过的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追求，替以实现自己在国家体制内得不到的那种公共权力。

本书主体内容就基本上围绕上述论点而展开。第一部分关于佛教的文化，主要是探讨佛教与理学的关系，梳理它们“函盖相合，冰炭不同”之融通的脉络。卜正民选择张岱这个在士绅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反映士绅文化中的佛教样态。第二部分关于寺院的捐赠，深入探讨士绅捐赠佛教寺院的机制和动机，鞭辟入里地分析士绅怎样捐赠寺院，为何捐赠寺院。卜正民选择了鼎湖山的捐赠者作为实例分析。第三部分捐赠的地方个案研究，卜正民选择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进一步揭示捐赠的普遍模式，反映寺院捐赠和当地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卜正民选择从宋到清这样一个更长的历史广角来揭示晚明寺院捐赠的历史意义，集中探讨了士绅借助于佛教在国家统治和地方自治追求中的两难抉择以及最终失落。

掩卷而思士绅社会历史之终结是非常有意义的。卜正民在本书最后写道：“历史最终对中国士绅是不仁慈的，无论他们也许多么熟练地利用地方的条件抵抗国家的风浪。只要帝国苟延残喘，他们进行地方社会从国家的部分分离的努力可能就从来没有完成。他们为

获得他们仍然依赖着的身份标志不得不周期性地回到政治制度的中心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两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所竭力反抗的国家的权威,他们就不可能坚持要求作为精英的合法性;然而只要他们依然依赖于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要求建立霸权。19世纪末公共领域的扩张使他们置身于推翻旧国家的革命的前沿。然而,伴随着革命而来的帝国形态的腐蚀却削弱了他们自己权力的社会政治基础……”结果可想而知,士绅的精英身份排除其他社会成分的加入和士绅的两难处境决定了他们除了自己的死亡没有别的出路。卜正民用讽刺的笔调说:“与革命势力组织人民去竞争对国家的控制相比,旧秩序的精英们发现他们偷走的小小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被推向一边,让位于新的社会。士绅社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三

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对本书的一个预期能很好地说明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他坦言1993年本书初版英文本时,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都不能肯定他是想对明代的佛教史作贡献,还是打算对明代的社会史作研究。在他看来,如果不考虑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现实世界背景,晚明佛教的复兴就无法被理解。同样如此,佛教的论题如果被排除在士绅社会研究之外,那么明代历史变迁尤其是士绅社会世界也就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卜正民的这个研究思路已经被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因为近年来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的西方学者开始拆除了宗教研究和社会研究的隔墙,接受了他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重大意义还不只是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能产生更有创造性的成果,而是这个成果可以直接弥补我国学者在近世佛教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力推动我们在佛教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大大拓宽我们的佛教研究从陈述史或义理性走向学理性领域。当

然,本书令人更有兴味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佛教在社会中运作的状况和机制以及社会人群对佛教的兴趣和追求两者之间的互动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此外,本书的成功还表现在作者充分利用国内学者不常用的寺志和方志,它让我们认识到古籍中语源的隽永和丰富,这些平时淹没在尘封故纸堆里的资料在卜正民这样一个“老外”生动的笔墨调遣下,居然还能组织成如此文采飞扬和引人入胜的篇章!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表现在似乎“形散”而其实“神不散”上。这也正是我提醒读者要耐心注意的地方。本书是卜正民在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据他自述修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印刻了他在许多地方逗留过的痕迹。卜正民对本项目的研究,置身于跨学科的语境中,他声明自己不是研究佛教的心理意义而是研究佛教的社会意义;他拒绝了那种对士绅的抽象的本质定义,但他也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历史分析。在本书导论阐述寺院捐赠与士绅之问题的那一章,读者也许会觉得过于冗长繁复,但其中含有相当多的西方流行的重大理论元素和概念如“公共领域”、“象征性资本”等,还包括他分析论证欧洲思想中阐述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特征的一些主要论点。这些概念和论点如果被轻轻滑过,那读者就很难理解本书的主旨所在,包括对他立论的出发点以及他选择的研究路径乃至对书名的理解都会一头雾水。这要求读者阅读本书时要具备必要的相关知识,当然其中也许还有一个文化语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名被翻译成“为权力祈祷”时,卜正民有些担心他这个书名包含着只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才能被充分认识的关键词,是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的确,这个书名看来有些迷人,但也很有意味。中国知识人浸淫西方文化时日非短,我国改革开放也已经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读者不会对此浅尝辄止。

最后我要借本书再版的机会对在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和机

构再次表示诚挚谢意。首先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府建明和戴宁宁，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精美的形式顺利问世，其中也凝含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这里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善本珍藏室的几位老师，他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但我永远记得我在那里查阅资料时他们所提供的方便。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注释中加了很多译注，这些译注不仅仅是我在北大图书馆“坐冷板凳”的见证，更主要的是记录了我查找不到原著作者所参考的古籍原文时使用的北大馆藏图书，以便于国内读者能按图索骥，保证有径可寻。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韩国师兄贾禹炫，为解决我翻译上遇到的难题，他不辞辛劳专门托请台湾的朋友带来吴智和写的《明代僧家文人对茶推广之贡献》，没有他的热心帮忙，有关寺院品茶的那两首诗可能就会给读者留下遗憾；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北大蔚秀园雅集，一起品茶，他弹琴我听琴而结下的深厚友谊。

张 华

中文版序言

中国佛教的社会史没有像它作为宗教史那样引起 20 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很大兴趣。陈垣在民国年间对晚明佛教作了精湛研究,但他是个极大的例外。这种学术倾向与西方和日本的学术对比格外鲜明。海外学者——尤其在 20 世纪后半叶——把中国佛教的研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知识领域,不仅仅是为了佛教研究,还因为它有助于拓宽对数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沧桑巨变的理解。为什么两种学术传统对佛教研究如此异趣?这也许是引导中国读者进入关于明代士绅精英赞助佛教寺院之研究的一条有益途径。

我觉得,中国和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佛教的学术价值的态度差异,导源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现代性经验的不同。在欧洲,现代性的核心标识之一,是破除与中世纪宗教有关的迷信思想。欧洲人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广泛的思想运动来协调中和这种对迷信的排斥:16、17 世纪经历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17、18 世纪又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西方人最终并未抛弃宗教,而是以新教的方式重新阐释基督教,消除了宗教不可置疑的绝对立场。因此之故,从 19 世纪开始,宗教被自由地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没有走同样的路线。中国学者数世纪以来一直对宗教实践的理性表示怀疑,但是他们的怀疑和争论从来没有被放在一个能破除宗教在社会中的权威的更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排斥仅仅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中,那时年轻的思想家们都挑战他们先辈的思想传统,认为中国宗教是他们现代化目标的绊脚石。这种思想爆发的突然性意味着中国现代派破除迷信达到了比欧洲更突然、更迫切的程度,就像一句英国谚语所说的“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抛弃”,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可能同迷信的过去休战,那么也就不可能宽容现在的佛教和道教。如果这些宗教不可能被宽容,那么宗教本身就不值得认真的学者去关注。结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待佛教,无论是实践还是研究,即使不是彻底的敌视,至少也是漠不关心。

欧洲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半个世纪间不仅对中国宗教有同样的敌视,并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外国人对宗教的立场不是漠不关心,因为其中多数人是基督教传教士。如果他们俯就中国人的宗教实践和宗教观念,那么这是基于一个很实际的理由。他们不得不否定中国宗教的价值以确立他们自己宗教的价值:他们决心用基督教的上帝来取代佛陀。在20世纪前半叶,这种态度随着西方的汉学能把自身与基督教传教事业区分开来而发生了转变。西方的学者对把中国人的差异转换成西方人的认同不再感到兴趣。相反,他们宁愿保存和维持这种差异,宁愿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是与西方趋同,而是一个经历了大不相同的历史过程并在未来能适当地期盼走自己道路的地方。中国宗教是吸引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中国宗教的观念和实践似乎与欧洲的宗教观念和实践相当不同。与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几乎任何其他亚洲研究领域相比,研究宗教方面的差异的吸引力更为强烈。

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兴趣并非毫无政治意义。它依赖于对(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宗教/迷信实践进行调查考察和分目归类的权力。由此所做的调查和分类可能是为了证明其他世界的低劣——这一定程度上也

是西方现代性的投射。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表明了这种态度,他在20世纪初写道: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他观察到当时的佛教只不过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僧团的神秘实践”。有关这种调查和分类的权力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它源于20世纪塑造学术知识形态的亚洲和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大多数研究中国宗教的欧洲学者都拒绝凌驾于亚洲的西方帝国主义主张。然而,他们的著作产生在后期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很自然,中国学者没有兴趣参与这种东方学项目。佛教的遗存——它的塑像、经典、神秘实践——正是西方学者也许想研究和“收集”的东西。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一个和他们的过去大不相同的关系中。这是一种克服和超越的关系,而不是恢复和保存在博物馆中的关系。只是到临近20世纪尾声,中国学者才有兴趣把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过去的一切方面变成现代知识的一部分。

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文化时,佛教恰巧成为我走进学术殿堂的入门。我大学时代修的第一门中国课程就是中国佛教哲学。我由此出发是因为我当初的兴趣根本不在中国,而在佛教,这是那时多伦多大学能开出来的唯一的佛教课程。在这种兴趣后面鼓舞人心的是畅行不衰的日本佛教思想家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的禅学著作。铃木以富有魅力的笔调阐述了一种迥异于我这个在新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学到的宗教世界观,激起了我好奇的兴趣并进而想学习更多。

1974年,我作为交换学生到中国留学时,我对佛教的新兴趣听起来令人沮丧。那时宗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是一块严加防范的禁区。然而,北京大学一位年长的图书管理员借给我《高僧传》,并介绍我阅读汤用彤的著作,凭这些材料为基础我开始了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生涯。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书信求教杰出的20世纪中国佛教史学家韦尔慈(Holmes Welch)先生。然后,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韦尔慈

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灵感源泉。这就是为何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我把本书献给的三位恩师之中。

在北大留学和哈佛读研之间,我还在复旦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复旦李庆甲教授和善的指导下,我的兴趣从思想史转到思想和社会史。尽管在我最终决定论文选题之前还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阅读和思考,但当我回到哈佛着手研究生项目时,我已经倾向于从明代的社会和制度史来钻研佛教。本书所论述的地方士绅精英和佛教公共机构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研究的结果。

在1993年本书英文本初版时,同时代的学者们都不能肯定我是想对明代的佛教史作研究,还是打算对明代的社会史作研究。我本人喜欢把此看做两者皆是。如果不考虑佛教研究和实践的现实世界背景,它就无法被理解。同样如此,佛教的论题如果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明代尤其是士绅的社会世界也就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几年内,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的西方学者开始拆除宗教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樊篱,并接受了我的研究方法。中国的读者也许乐意“萧规曹随”吧。

最后,我非常感谢刘东先生把拙作纳入他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要深深地感谢他的学生张华博士和我的学生孙竟昊为本书的精彩翻译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卜正民

鸡鸣寺庭院中摆放着两块大理石碑,碑身的半部各被长长的蓝白相间的塑料防水布覆盖着。雕刻匠坐在阴凉处,在一块石碑的表面上镌刻出算盘珠一般齐刷刷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人的姓名。石碑的上端已经刻出两排数十个名字,还有许多名字等着他刻呢!我没有必要问他刻这些名单干什么,因为在每一个姓名下面都刻着钱款。1989年春我在南京逗留时,鸡鸣寺正在修复中,这些姓名就是捐助修复的功德主的名字。两块大理石碑一旦雕刻完毕,就要树立在鸡鸣寺院中,以表彰施主们的慷慨捐赠。捐赠者的姓名与石碑同在,流传千古。

雍和宫是北京的一座喇嘛寺,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修复了。同年(1989)稍后我去参观时,发现刻有功德主姓名的石碑已经树立在大殿前的庭园之中。石碑上前面十排总共排列了150多个姓名。石碑的最上端镌刻着一条装饰华丽的龙,龙嘴里喷出四个字:“万古流芳”,以示捐赠者芳名因其善举将流传万世。对那些错过这种扬名机会的人来说,还有可能在1989年秋天作一次捐赠,重塑内殿里的佛像。庭院另一边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捐赠功德簿,供来寺院参观的捐赠者签名,工程完毕后他们的姓名将被正式镌刻在石碑上。

在中国,树立石碑公布施主的善名,这种古老的习惯近年来得到了复兴。20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酿就了新的捐赠风气,推动了树碑立传的小小浪潮。这种新生代的石碑属于大大变化了的环境的产物,捐赠的社会意义在16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石碑仍然充当着标准的宣传形式,纪念捐赠者的功德及其所赞助的项目。石碑并非简单的捐款记录。它所保存的不单是财富,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一块石碑通过记录谁捐赠,就等于宣布了谁能捐赠,谁希望以捐赠来扬名,谁寻求以捐赠而使他在相关的社会群落中增加声望。因而,它证实了捐赠者和非捐赠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捐赠形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其隐含的内容随嵌含在碑文中的社会状况而变化,社会状况则随着时间迁移而转换。

本书涉猎经受了四个世纪历史风霜的石碑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它探讨晚明中国寺院捐赠的社会结构,着重考察地方士绅,他们是那个时代经济上捐赠寺院的主要力量。士绅是晚期帝制中国的精英。他们的正式地位来自在国家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成绩和所取得的功名或头衔。在16世纪,士绅集团既指功名及第者,又包括他们由父系亲属、姻亲关系和社交网络而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圈子,他们在主宰地方事务的范围和权力上大大扩张。为了表达这种权力,他们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公共活动,向佛教寺院捐赠也许是他们显示权力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类型。

乍一看,佛教似乎代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一个基于民众虔诚信仰的王国,士绅则往往对其敬而远之。毕竟,正统的儒者鄙弃佛教,认为它是人民大众的迷信;官方则怀疑佛教是危及国家安全、产生秘密结社活动的一个渊藪。而20世纪的学者们宣称,明代佛教已经衰象丛生,枯叶凋零。可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晚期之间(晚明),寺院石碑上一直镌刻着大量地方士绅捐赠者的名字,这使我注意到想像中已奄奄一息的宗教道场,在士绅精英的努力下却恢复出盎然生机,而精英的培养却是要对佛教采取敌视态度的。这既令我困惑不解,